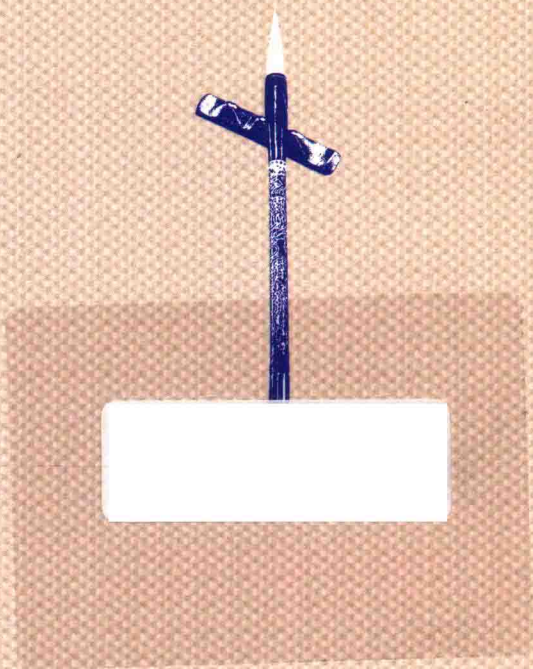


# 民国清流

## 大师们的中兴时代

叁

汪兆骞 ©著



中国出版集团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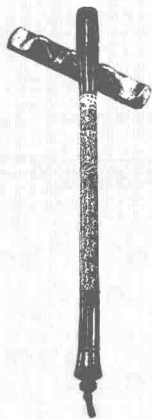
现代出版社

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

# 民国清流 叁

## 大师们的中兴时代

汪兆骞 ◎著



中国出版集团



现代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民国清流·大师们的中兴时代 / 汪兆骞著. —北京: 现代出版社, 2016.7  
ISBN 978-7-5143-5031-9

I. ①民… II. ①汪… III. ①文化—名人—生平事迹—中国—民国  
IV. ① K825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136792 号

## 民国清流·大师们的中兴时代

---

作 者 汪兆骞  
责任编辑 张 霆 姚冬霞  
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 
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 
邮政编码 100011  
电 话 010-64267325 64245264 (传真)  
网 址 www.1980xd.com  
电子邮箱 xiandai@vip.sina.com  
印 刷 三河市宏盛印务有限公司  
开 本 710mm×1000mm 1/16  
印 张 18.5  
版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 
书 号 ISBN 978-7-5143-5031-9  
定 价 45.00 元

---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; 未经许可, 不得转载

# 目 录

## 第一章 民国二十年（1931）/001

胡适重返北京大学，拉开“北大中兴”序幕。九一八事变唤起国人和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和血性。

“你总是这样叫人牵挂”——胡适重返北京大学 / 005

“隐逸态度为宜”——周作人躲进“苦雨斋” / 013

“北平是我的老家”——老舍拓宽了小说题材的疆域 / 020

北京大学“三大魔”之一——废名与《骆驼草》 / 031

嘲讽鲁迅“为一世故老人”——以《狂飙》闻名的高长虹 / 039

## 第二章 民国二十一年（1932）/045

胡适、丁文江、傅斯年、蒋廷黻等在北平创办《独立评论》周刊。陈独秀被捕，文化界声援。

“走到哪里，哪里就会响起叫骂声”——钱玄同与章太炎、刘师培的交谊及晚节 / 049

“一条清溪，澄澈到底”——由叛徒到隐士的刘半农 / 059

“毕竟书成还是否，敢将此意问曹侯”——将《红楼梦》研究当作

终身事业的俞平伯 / 069

### 第三章 民国二十二年（1933）/ 081

内忧外患，国难当头，政府昏聩，民不聊生。文化界一片肃杀之气。

“真迷众色看如雾”——沈从文是一本内容复杂、分量沉重的大书 / 085

“我弦索上迸落着明珠”——冰心，从清丽温婉的《繁星》《春水》

到寓意深邃的“问题小说” / 098

人艳如花——才女作家林徽因及“太太的客厅” / 106

中国哲学界第一人——金岳霖及与林徽因的爱恋 / 115

“生气勃勃，勇敢结实”——萧乾的小说与报告文学 / 130

### 第四章 民国二十三年（1934）/ 137

夏衍称 1934 年是“军事‘围剿’和文化‘围剿’最严酷的时期”。周作人与鲁迅就“论语派”开展论争。

“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”——红极一时的通俗小说家张恨水 / 141

“半是儒家半释家”——《五十自寿》与重访日本“寻梦”的周作人 / 156

“争自由的方法在于负责任的人说负责任的话”——国事日蹙，胡适创办《独立评论》 / 169

## 第五章 民国二十四年（1935）/ 179

争取抗日救亡的言论，一浪高过一浪。马相伯、沈钧儒、章乃器等二百八十三人联合署名发表《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》。

一身重病，宁死不屈——诗人、散文家朱自清与郭沫若 / 183

“我是在新诗之中，又在新诗之外”——闻一多探索新诗格律化中的是非 / 194

“一生为故国招魂”——钱穆把东方的智慧带出了樊笼，来充实自由世界 / 207

“黄门侍郎”投入胡适门下——傅斯年给儿取名“仁轨”及与胡适、鲁迅的关系 / 221

“谬承遗命倍伤神”——文化传统呵护人陈寅恪 / 231

“表现出普遍的固定的人性”——有理论素养、富有个性的严肃批评家梁实秋 / 240

## 第六章 民国二十五年（1936）/ 249

华北危机迫在眉睫，全国纷纷要求团结御侮的同时，新闻界、文化界争取言论自由的呼声，响彻大江南北。西安事变发生，举国震惊。

“为国家做一个诤臣”——胡适抵御日本、保卫国家的思路 / 253

把鲁迅当作“人”，不是当作“神”——周作人在“苦雨斋”并不  
“专谈风月”，对乃兄认识透彻 / 264

“矜矜自守之节，老而弥笃”——集状元、共产党员于一身的教授  
吴承仕 / 281

尾声 / 290

第一章

民国二十年

(1931)

胡适重返北京大学，拉开“北大中兴”序幕。九一八事变唤起国人和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和血性。





1931年，是民族危机爆发的一年。南京政府公布《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》，严刑峻法，严加控制言论。7月，新月书店北平分店被搜查，几百册《新月》被抄没。王造时登上书生论政舞台，在《新月》发表《由“真命天子”到“流氓皇帝”》檄文，酣畅淋漓，讥讽当局，是《新月》论政时代结束前最为响亮的鸣镝。

胡适重返北京大学，选聘丁文江、徐志摩、钱穆、李四光等著名学者到北大执教，一时间，北大人才云蒸霞蔚，社会各界谓之“北大中兴”。

九一八事变唤醒了国人的爱国热情和血性。胡适等知识分子在关乎国家存亡的历史关头，以一腔爱国热忱投入这场民族自卫战争。

此时的周作人是以大时代弄潮儿的身份登上历史舞台的。但到了1931年，他在致信汪馥泉时说，当前“封建思想更深且重，所以社会现象亦更不佳，既无反抗之志与力，我想且稍取隐逸态度为宜”。其散文中温暖的人情和人性也渐渐淡化。

冰心散文集《南归》《先知》出版。朱自清作《论诗学门径》《论中国诗的出路》。沈从文《论朱湘的诗》《论刘半农的〈扬鞭集〉》《论中国的创作小说》等论文发表，创作小说《夜渔》《三三》《虎雏》《黔小景》等。胡适发表评论《评〈梦家诗集〉》《以钱穆先生论〈老子〉问题书》《论牟子〈思想论〉》《辨伪举例——蒲松龄的生年考》《〈醒世姻缘传〉考证》等，出版《淮南王书》。



## “你总是这样叫人牵挂”——胡适重返北京大学

1930年11月30日，胡适在北方凛冽的寒风中，抵达北平，卜居后门内米粮库四号。距1927年5月17日，自北平迁居上海，已过三年半。其间，胡适曾三次回到北平。

1929年1月，作为董事会董事，胡适北上参加了北平协和医学院校董事会议。他抽空去探望在重病中的老朋友梁启超，不料他赶到时，梁氏刚刚病故几个小时，他悲痛中参加其大殓。后又去北京大学旧地重游，感触良多，赋诗《三年不见他》感怀：

三年不见他，  
就自信能把他忘了。  
今天又看见他，  
这久冷的心又发狂了。

我终夜不成眠，  
萦想着他的愁、病、衰老。  
刚闭上了一双倦眼，  
又只见他庄严曼妙。

我欢喜醒来，

眼里还噙着两滴欢喜的泪，  
我忍不住笑出声来：  
“你总是这样叫人牵挂！”

1930年6月和10月，胡适受邀到北平演讲与参加学术活动，同时也为来北平寻租新房。胡适在日记中说，他每次演讲都是人满为患，一次到协和医学校用英文演讲，听众仍将会场挤得满满的。通常，关于哲学之类学术性很强的演说听众总是寥寥无几，然而北平的学术界、教育界，总是热情地挤进会场，去听胡适的演讲，显然是对他的思想和文化人格，充满敬意和支持的。10月17日，胡适在日记中写道：“我觉得对社会国家的责任也更重，因为人对我的期望更大了。我如何能负这许多人的期望呢？”胡适常用“凡执事不敬，未有不败亡的”这句话自勉、约束、鞭策、砥砺自己，为中华民族的崛起，勇敢无畏地奉献自己的才智。这句话是在给张学良的信中说的。今天听来，仍掷地有声。

12月6日，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为胡适开欢迎会，他的学生傅斯年发表热情而真诚的欢迎词，令胡适颇为动容。胡适致答词曰：“生平抱三个志愿：一，提倡新文学；二，提倡思想改革；三，提倡整理国故。此三事皆可以‘提倡有心，实行无力’八个字作为我的定论。”

四天后北京大学为他举行欢迎会，北大代理校长陈大纪、哲学系主任张真如等参加。胡适致答谢词曰：“我们当前的问题是社会、国家、人生、思想，我们应该注意活的问题，不该专研究过去历史上死的问题。古代的成功或失败，仅是我们的指导和教训。我们应该领导社会思想，研究中国当前的社会问题。”

12月17日夜，胡适在北平的米粮库四号宅第，灯火通明，北平各界好友欢聚于寿宴，贺诗拜寿，在生日蛋糕上点起四十支红烛，举杯用英文

唱寿诞之歌，为胡适四十大寿祝福。那夜，飘起纷纷扬扬的瑞雪。

1931年1月，胡适到北京大学任教，几经推辞，到1932年才接受北京大学校长也是他的经年老友蒋梦麟的坚请，受聘为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系主任之职。

胡适到北大后，蒋、胡二人多次围炉商议，拟就了一个雄心勃勃的重振北大、加快发展的周密计划。他们再次打出老校长蔡元培“教授治学，学生求学，职员治事，校长治校”的方略，兼设“校务委员会”取代过去的“校评议会”。改文、法、理三“科”为“三学院”，定周炳琳为法学院院长，刘树杞为理学院院长。蒋梦麟自唱白脸，负责“辞退旧人”，请胡适唱红脸，“选聘新人”。胡适如炬慧眼，“选聘”了丁文江、徐志摩、钱穆、李四光、陶希圣、孟森、汤用彤等著名学者、教授到北大执教。一时间，北大人才云蒸霞蔚，社会各界谓之为“北大中兴”。

胡适的《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》(七章)，也由新月书店正式出版。胡适身在北平，忙于办学，仍不忘为自己在上海发动的人权舆论辩护。是年年初，胡适致信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陈布雷，强调“《新月》同人在提倡这种个人签名负责的言论自由”，“此类负责的言论，无论在何文明国家之中，皆宜任其自由发表，不可加以压迫”。

1930年11月4日，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及第八区党部，将写文章批评国民党的罗隆基告到上海警备司令部，指责罗隆基“言论反动，侮辱总理”，罗隆基遂被警备司令部公安局拘捕。在胡适多方营救下，罗被保释。不久，罗又写《我的被捕的经过与反感》。当局又以“挟忿诋毁”为由，强令光华大学开除罗氏。为此，胡适曾代光华大学校长草拟了一个《上蒋介石呈》，直接向蒋介石解释其事缘由并为罗隆基鸣冤，“今有一事上陈，即教育部飭令光华大学撤去罗隆基教员职务是也。罗隆基在《新月》杂志

发表言论，意在主张人权，间有批评党治之语，其措辞容有未当。惟其言论均由个人负责签名，纯粹以公民资格发抒意见”，拟请免职撤换处分，以示包容云云。

当时的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，极力支持胡适，他以校长的身份，给蒋介石上书，力保罗隆基。但翌年1月，当局还是以“言论谬妄”，强令光华大学辞退罗隆基的教职。罗继续在上海主编《新月》，依然锋芒毕露地发表他的书生论政。5月，汪精卫在上海《民报》发表文章说，中国当时有三种思想鼎足而立：共产主义、《新月》派和三民主义。

张寿镛虽多年在朝为官，但以其正直和理性，站到了胡适的一边。张寿镛（1875—1945），字伯颂，号泳霓，浙江鄞县（今宁波）人。乃明末抗击清兵的英雄张煌言的后裔。张煌言，崇祯时的举人。弘光元年（1645），清兵攻陷南京，他与钱肃岳等官吏倡议奉鲁王朱以海监国。清兵入浙东，军败又随鲁王逃浙闽沿海，后入据舟山。永历八年（1654），钱肃岳率军北伐。张率军经宁国、徽州北上。因郑成功兵败，深入无援，又返回浙东，居悬岙岛（今象山境），不久，被清兵所俘，在杭州遇害。有《张苍水集》《北征集》等留世。

张寿镛出身名门，曾在江苏、浙江等地为官。民国后，历任浙江、湖北、江苏、山东四省财政厅厅长。1927年，国民政府定都南京，任命张寿镛为国民政府财政部次长。后辞去官职回上海创办光华大学，亲任校长，并兼教授。他虽纯为中国传统文化哺育的学者，却注重汲取西方文化精华，中西合璧，办学有成。但他对中国文化最突出的贡献，是穷半生心血，收集、保存、校勘、编辑、出版了《四明丛书》。

《四明丛书》搜集了鄞县历代文化散佚的文献一百七十八种，极具文献价值，堪称文化瑰宝。藏于宁波天一阁。

两天后，即1931年1月17日，陈布雷回信给胡适称，“此事部中既

决定，当不能变更”，并表示愿意与胡适等人建立“一个初步的共同认识”。胡适立即从北平再致信陈布雷：“鄙意‘一个初步的共同认识’必须建筑在互相认识之上。”并托井羊先生带上《新月》两份，分别送给陈布雷和蒋介石，希望二人浏览这几期《新月》的言论。胡适还在信中表示，他们看过之后，“该‘没收焚毁’（国民党中宣部密令中语），或该坐监枪毙，我们都愿意负责。但不读我们的文字而单凭无知党员的报告，便滥用政府的威力来压迫我们，终不能叫我心服的”。

这信，一如胡适在上海的三年半，其政治言论义正词严、理直气壮、毫无顾忌，文章笔势酣畅淋漓。但可悲的是，胡适自己被政治冲撞得鼻青脸肿、鲜血淋漓，却一直对蒋介石尚存幻想。

北京大学新学期开始，胡适开讲“中古思想史”。1931年5月，榴花绽放时，他收到在燕京大学图书馆做工的吴晗的一封信，他在信中说自己正在作《胡应麟年谱》的情况。胡适对胡应麟也有研究，其《文存》有这方面的文章。见信中吴晗寻出吴之器为胡应麟所作的传，推断出“胡氏的卒年是在万历三十年壬寅（1562），存年五十二岁”，与自己推断相关甚微，甚是高兴。他在给吴晗的信中说：“我记得你，并且知道你的工作。你作《胡应麟年谱》，我听了很高兴。”但指出“你信上在万历三十年下注：‘1562’，是大错。不知何以有此误。此年是1602。生年是1551”。最后，胡适夸年轻的明史研究者吴晗，“你的分段也甚好，写定时我很想看看”，并邀请他“星期有暇请来谈。罗尔纲君住我家中”。

胡应麟，字元瑞，号石羊生。浙江兰溪人，与胡适同乡。万历中举，屡试进士不第，筑室山中，收藏图书四万余卷，从事著述。其幼能诗，承建安七子诗风而有变化，著有《少室山房类稿》《诗薮》，很有学术价值。



四个月後，吳晗再次寫信給胡適，告之蔣廷黻先生勸自己研究明史。胡適致信吳晗說：“蔣先生期望你研究明史，這是一個最好的勸告。”信中说，“秦漢時代材料太少，不是初學所能整理”，“晚代歷史，材料較多，初看去似甚難，其實較易整理，因為處處腳踏實地，但肯勤勞，自然有功。凡立一說，進一解，皆容易證實，最可以訓練方法”。

信中還以自己多年治學經驗，從五個方面解答了吳晗所提的幾個問題，並將有關學者謝國楨、孟森及其著作介紹給吳晗。最後告誡：“請你記得：治明史不是要你做一部新明史，只是要你訓練自己做一個能整理明代史料的學者。你不要誤會蔣先生勸告的意思。”

其實，二十幾天前，胡適為了安排吳晗的學習及工作，已給兩位老朋友翁文灝、張子高寫信，向他們推薦吳晗。信中说：“清華今年取了轉學生之中，有一個吳春晗，是中國公學轉來的。他是一個很有成績的學生，中國舊文史的根柢很好。他有幾種研究，都很可觀，今年他在燕大圖書館做工，自己編成《胡應麟年譜》一部，功力判斷都不弱。此人家境甚貧，本想半工半讀，但他在清華無熟人，恐難急切得工作的機會。所以我寫這信懇求兩兄特別留意此人，給他一個工讀的機會，他若沒有工作的機會，就不能入學了。我勸他決定入學，並許他代求兩兄幫忙。此事倘蒙兩兄大力相助，我真感激不盡。”胡適還建議請清華的教授讀吳晗的《胡應麟年譜》，“也許他們用得着這樣的人作‘助手’”。並附上《胡應麟年譜》。

胡適對吳晗無私的關心和指導，使他受益終身。幾年後，吳晗成為一位頗有成就的明史學者。

成為明史專家的吳晗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，以學者從政，曾任北京市副市長，是大肆拆毀燕京古城的吹鼓手。1966年，“文化大革命”爆發，吳晗因京劇劇本《海瑞罷官》、雜文《燕山夜話》等，與鄧拓、廖